

王强 著

自律 与 他律

近代中国银行业
风险防控机制研究（1897-1949）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自律与他律

近代中国银行业
风险防控机制研究（1897-1949）

王强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律与他律:近代中国银行业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1897~1949 / 王强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458-1265-7

I. ①自… II. ①王… III. ①银行风险-风险管理-
研究-中国-1897~1949 IV. ①F832.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3051 号

责任编辑 马丽娟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汪 昊

自律与他律:近代中国银行业风险防控机制研究(1897—1949)

王 强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260,000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265-7/F·33
定 价 5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一、选题缘起	1
二、学术史回顾	8
三、研究主旨与结构	15
四、史料与方法	18
第二章 银行内部风险防控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20
第一节 近代银行人事管理的专业化与防弊设计	20
一、银行职员的专业化	20
二、职员保人制度	31
三、信用保险制度的演进	36
第二节 内部业务监控制度的构建与发展	46
一、管理权限的相互制衡	47
二、业务分科制度	54
三、内部业务稽核	58
第三节 会计独立与制度演进	68
一、会计部门与业务独立	69
二、会计簿记改革与制度演进	76
三、会计检查、监督与成效	83

第三章 近代银行业市场风险的预测与化解	88
第一节 信用调查与银行业资金安全	88
一、银行业信用调查的发生发展	89
二、银行征信的专业化与社会化	96
三、传统跑街的继续存在	107
第二节 资金运用管理的强化	113
一、头寸的内部统筹与集中管理	113
二、严格放款管理	122
三、投资风险的分化	135
第三节 呆坏账管理	148
一、清理不良旧欠	149
二、盘活不良贷款	156
三、债务企业的委托管理	168
第四章 集体安全下的同业联合	176
第一节 联合准备	176
一、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制度的发轫	179
二、联合准备业务的开展与演进	185
三、联合准备与银行业集体安全	189
第二节 同业联营	195
一、联合发行	196
二、联合储蓄	203
三、联合投资与放款	210
第五章 同业互助与行业监督	218
第一节 同业合作与互助	218
一、日常经营中的资金融通	219

二、金融风潮中的同业互助	225
三、银行倒闭案中的同业救助	236
第二节 行业风险监督	244
一、行业监督规范与制度	244
二、业务指导与检查	249
第六章 政府风险监管	255
第一节 北京政府时期银行风险监管	255
一、近代银行风险监管的发轫	255
二、北京政府时期的监理官制度	260
三、北京政府时期银行发行监管	264
第二节 南京政府时期银行风险监管	273
一、加强银行业监管的初次尝试	273
二、抗战前南京政府的发行监管	278
第三节 战时银行风险管控	283
一、头寸管制	284
二、发行监管	288
三、业务管控	292
第七章 结 语	303
一、风险防控机制中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	303
二、从行业自律到国家管控	313
三、近代银行业的风险变量与波动趋势	322
参考文献	332
后 记	339

表格目录

表 3-1	中国征信所会员银行分类.....	101
表 3-2	各分支行处在交通银行总行定期户存额统计表 (1933—1936).....	116
表 3-3	各分支行处向交通银行总行透支户款额统计表 (1933—1936).....	118
表 3-4	三十五家华资银行信用放款占比统计(1921).....	127
表 3-5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各类放款占比统计(1931—1934).....	129
表 3-6	金城银行商业部历年各种性质放款占比统计.....	130
表 3-7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押款统计表(1931 年 12 月).....	132
表 3-8	1936 年底交通银行各项投资统计.....	138
表 3-9	交通银行政府欠款占放款总额比例统计(1923—1926).....	149
表 3-10	1932—1936 年交通银行政府借款增长情况.....	150
表 3-11	交通银行政府旧欠款项分类比较表 (1936 年 12 月 31 日).....	152
表 3-12	停工中各纺织公司负债情况统计(1936 年 4 月).....	158
表 3-13	银行资本接管各纱厂情形(1931—1937).....	164
表 3-14	新裕(溥益)纱厂 20 支棉纱生产成本统计 (1932—1937).....	170
表 4-1	上海四行准备库历年发行准备概况统计(1923—1931).....	199
表 4-2	四行准备库历年发行总额与全国重要银行比较.....	201
表 4-3	四行储蓄会历年存款及占比统计.....	205

表 4-4	四行储蓄会向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银行放款统计 (1923—1937)	208
表 4-5	北四行联合投资与放款情况统计(1921—1937)	211
表 5-1	中国银行同业拆借占比统计(1922—1928)	221
表 5-2	中国银行同业放款占比(1930—1934)	223
表 5-3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历年存放同业及总资产比例统计	224
表 5-4	京津沪汉代兑中法实业银行钞票数目统计	242
表 6-1	各省官设银钱行号发行纸币数目统计	268
表 6-2	财政部银行监理官办公处设置地点及管辖区域一览表	298
表 7-1	重庆市各年之比期放款利息统计(1934—1942)	306
表 7-2	四联总处分支处贴放余额分类统计(1942)	311
表 7-3	重庆市银钱业放款分类表(1944)	312
表 7-4	全国银行总分支行地域分布统计(1934)	314
表 7-5	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各项数据比较(1934)	318
表 7-6	交通、中国、上海、金城四家银行放款占存款比例	323
表 7-7	金城银行放款对象统计	326
表 7-8	重要银行历年各项存款准备金率平均统计	329

第一章

导 论

一、选题缘起

风险与银行业总是形影不离的,这是由银行业的行业性质决定的。从属性上看,银行业为“收集资金,制造信用,及便利财货交换之机关,换言之,为资金信用集中与分配之机关”^[1],因此,受信与授信是银行业的两大基本业务,居于社会融资的中介地位,不同渠道、方式的社会信用关系皆以银行为枢纽,呈现出相互交织、相互联动的中心网状结构,任何一个信用关系出现问题,都可能通过网状信用结构传递到其他的信用关系。此外,与银行发生信用关系的对象十分复杂,其具体信用状况往往难以精确估量,也进一步增加了银行业风险控制的难度。能否有效实施风险控制,化解与消弭金融风险的损失与影响,是衡量银行业发展质量的主要参考,对先天发展不足、后天环境恶劣的近代中国银行业来说尤其如此。

近代中国的现代银行,肇始于外国在华银行业,从 1845 年丽如银行在上海设立第一家分行,到 19 世纪 90 年代,先后又有麦加利银行、有利

[1] 杨荫溥:《五十年来之中国银行业》,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896—1947)》,六联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947 年版,第 39 页。

银行、阿加喇银行、汇隆银行、法兰西银行、汇丰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德华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华俄道胜银行、花旗银行、华比银行、荷兰银行等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开展业务。〔1〕有清一代，外国在华设立过营业机构的银行不下40家，其中经过改组、清理或倒闭，至清王朝覆没时尚在营业的有11家，据上海《银行周报》统计，1927年时依然存在的外国在华银行计有23家。〔2〕

在具体金融业务上，外国在华银行通过政治、经济优势，甚或军事威胁等手段，在我国外汇市场、货币发行与存款吸收等方面居于垄断地位。晚清时期的外汇市场，几乎全部落入外国银行之手，“每日之外汇行市，亦全视外行汇丰之挂牌，内国金融界，悉听其指挥”〔3〕。发行货币方面，汇丰、麦加利、花旗、东方汇理、有利、德华、华比、横滨正金等银行皆曾在中国发行纸币，并不受中国政府节制。以花旗银行为例，1907年在华发行纸币价值160,344美元，其间发行总额一路飙升，至1933年，发行总额已达2,500万美元之巨。〔4〕据统计，辛亥革命前夕，仅有统计的10家在华发行纸币的银行，发行总额既达3,500万元。〔5〕这些纸币“流通极盛，对我币制统一影响甚巨”〔6〕。除上述特权外，外国银行还利用其优势地位，大肆吸收华人存款。以汇丰为例，1865年其吸收华人存款仅为338万港元，但短短数年后的1871年，这个数字已超过1,000万港元，1885年更高达6,561港元，19世纪90年代，吸收存款总额更是超过1亿港

〔1〕郭孝先：《上海的外国银行》，《上海通志馆期刊》第2卷第2期，1934年2月；上海通社编：《旧上海资料汇编》（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279页；洪霞管：《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161页。

〔2〕子明：《经济侵略下之外国银行》，《银行周报》第11卷第12号，1927年4月。

〔3〕杨荫溥：《杨著中国金融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47页。

〔4〕《花旗银行历年在华发行纸币统计表》，载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第638页。

〔5〕这十家发行纸币的银行为英国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中俄合办的华俄道胜银行。其中，除华俄道胜银行曾得到清廷特许发行纸币外，其他银行均为未经许可擅自印发。参见卓遵宏：《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1887—1937）》，台湾国史馆2009年版，第21—22页；献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7页。

〔6〕沈春雷：《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社1939年印行，第371页。

元。〔1〕花旗银行则注重吸收名人大户的存款,如根据花旗档案的记载,庆亲王奕劻在花旗北京分行存有30万元巨款。民国初年,不少政商要人如宋子文、宋子良、荣宗敬、王晓籁在花旗的存款均数量可观。至1919年,花旗在中国吸收的存款高达4,170万美元,占其全球所有分支行全部存款总额的46%左右。〔2〕外国在华银行的资本规模也远超中国银行业,根据1931年的数据统计,当年外国在华银行51家,拥有资本总额1,409,406,418元,华资银行共161家,资本总额288,838,565元,仅为外国银行的五分之一强。〔3〕可以说,近代中国银行业诞生之初,就必须直面外国在华银行这个实力雄厚的竞争对手。

同时,中国传统钱庄业也并未因现代银行业的出现与壮大而有所萎缩,反而呈逐渐增长之势。以钱庄业比较集中的上海为例,1912年上海一地共有钱庄28家,资本总额折合银元1,488,000元,每家平均资本额53,100元,至1926年,钱庄数量增加至87家,资本总额18,757,000元,每家平均资本额增至215,600元,〔4〕钱庄数量、资本总额以及单个钱庄资力皆有大幅增长。钱庄也因其信用放款、组织严密、无限责任、手续简便等行业特征,在汇兑、贴现等诸多金融业务中十分活跃,钱庄开出的庄票在商业贸易领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5〕

相较于外国在华银行与传统钱庄,近代中国银行业的起步较晚。直到19世纪末,第一家现代意义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才于1897年4月26日正式成立,总行设于上海。〔6〕此后到辛亥革命前夕,陆续又有直隶省银行、户部银行、浚川源银行等17家银行成立,分布于上海、天

〔1〕 洪霞管:《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第74页。

〔2〕 《花旗银行1919年下半年业务半年报告》,载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第589—592页。

〔3〕 《外国在华银行资本与行数统计表》,《财训》第1卷第1期,1936年1月,第18页。

〔4〕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91页。

〔5〕 施伯珩:《钱庄学》,上海商业珠算学社1931年印行,第17—19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初创时期(1897—19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9页。

津、北平、成都等地。^[1]但总体上看,无论是资金规模还是经营能力,这些银行都无法与外国在华银行、钱庄、票号近代三大金融势力相抗衡。直至进入20世纪,尤其是辛亥革命后票号的迅速衰落,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资银行业的暂时缺位,中国银行业获得了快速成长的空间,并日益发展成为不可替代的金融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舶来品的近代银行制度与理念,与中国传统经济和社会经验的融合,注定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其中,由同业竞争激烈、经营理念滞后、经济危机波及、央行制度缺失、政府监管缺位等诸多问题导致的金融风险,是窒碍近代中国银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风险性质上看,近代中国银行业出现的金融风险主要可以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外源性风险。所谓外源性风险,即由银行外部因素导致的金融风险。梳理近代金融风潮的史实,可知引发金融风险的外部因素很多,既包括与世界经济贸易体系接轨之后,西方经济危机、金银价格波动、商品进出口贸易等世界经济异动对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冲击,又包括国内特殊的经济环境如银钱关系、外资银行竞争、工商业低迷、货币体系混乱等对银行业务的影响。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莫过于1929年西方经济大危机给中国银行业带来的影响。危机爆发后,很快通过进出口贸易以及货币流通体系等渠道波及中国工商业,缫丝、棉纺织等传统行业一蹶不振,^[2]白银价格的剧

[1] 这些银行包括中国通商银行(1896年,上海)、直隶省银行(1902年,天津)、户部银行(1906年,北平,1908年改组为大清银行)、浚川源银行(1906年,成都)、信成银行(1906年,北平)、四海通银行(1907年,新加坡)、浙江兴业银行(1907年,上海)、大清银行(1908年,北平)、交通银行(1908年,北平)、四明商业银行(1908年,上海)、信义银行(1908年,镇江)、裕商银行(1908年,未详)、浙江银行(1909年,杭州)、北洋保商银行(1910年,北平)、福建银行(1911年,福州)、四川银行(1911年,成都)、殖业银行(1911年,天津)等。参见杨荫溥:《中国之银行业》,《中央银行月报》第5卷第1期,1936年1月,第27页;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5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1935年印行,第F2页。

[2] 《江浙丝业之危机及政府救济办法》,《商业月报》第12卷第4号,1932年4月;《丝业恐慌中各专家对救济问题之论见》,《国际贸易导报》第3卷第2—4号合刊,1932年4月;《民国二十一年棉纺织业之回顾》,《工商半月刊》第5卷第3号,1933年2月;《华商纱厂联合会年会报告书》,《纺织周刊》第3卷第18期,1933年5月。

烈波动也使本已脆弱的农村经济陷入危机。^[1]工商业与农村经济凋敝之下,银行业自然不能幸免,大多数银行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严重困难时期。^[2]受工商业低迷的影响,不少中小银行发生挤兑风潮甚至倒闭。^[3]其他又如银钱混用、币种繁杂的货币体系,无限责任的钱庄因投机造成的信交风潮等畸形的社会经济特征,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银行业外源性风险发生的可能。

(二) 经营性风险。此类风险主要为银行在内部管理与业务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在内部管理方面表现为风险管理意识与思想薄弱,风险管控制度、防止行员舞弊机制的缺失等,业务经营方面则主要表现为存贷比例失调、资金分布失衡、资金投机、呆账增加等。经营性风险是银行业风险构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取决于银行业自身风险意识与风险防控制度的完善程度,同时也受到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客户信用状况变化的影响。经营性风险对于银行业来说是可控的,通过风险预防与管控机制可以有效避免风险发生或减小风险造成的不良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经营性风险的防控是反映银行业资金运用能力与水平的重要尺度。

无论从内部风险管理,还是业务经营方面,我们都可以发现近代中国银行业存在的风险漏洞。这些风险漏洞部分是由于银行业发展初期,风险意识与防控制度不完善所致,如1904年中国通商银行镇江分行经理尹稚山利用职务之便编造假账,侵占镇江海关官款四十余万两的舞弊大案,即为通商银行成立初期内部查账制度不健全导致的结果^[4];部分缘于

[1] 冯子明:《农村问题之严重》,《银行周报》第16卷第44号,1935年11月;陈春生:《我国农村经济崩溃之危机及救济方案》,《商业月报》第12卷第10号,1932年10月;蔡斌咸:《现阶段中国农村金融恐慌的检讨》,《新中华》第3卷第13期,1935年7月。

[2] [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等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页。

[3] 根据吴承禧先生的统计,仅1934年发生的挤兑风潮就有济南中国实业银行、粤省银行、晋省银行、安庆四省农民银行、河南农工银行、天津大中银行等,芜湖、天津、济南、青岛等地之中国实业银行也因中国兴业银行倒闭之影响,发生挤兑事件。该年倒闭的银行包括中国储蓄银行、安徽银行、农工银行、嘉南银行、南华银行、五华银行、中国兴业银行、嘉兴商业银行、山西祁县农工银行与华东银行。参见吴承禧:《民国二十三年度的中国银行界》,《东方杂志》第32卷第2号,1935年1月。

[4]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初创时期(1897—19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3—177页。

银行非理性的投资行为所致,如北京政府时期银行业用于投机公债、地产、外汇的资金往往占有全部投资的较大比例,银行资金运用具有浓厚的财政寄生性与投资投机性。〔1〕

(三) 政策性风险。政策性风险是指银行业的金融业务因相关政府管理部门或行业管理组织金融政策的变化引起的不确定性,由于它来自于强力部门,不受银行业自身决策的影响,因此政策性风险一般具有非市场化、强约束性等特征。

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生与发展,涵盖了晚清政府、北京政府、南京政府三个历史时期,其中又经历了清末新政、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抗日战争、战后金融崩溃等诸多特殊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政府关于银行业的政策多有不同,甚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行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银行管理意图亦大相异趣,完善制度者有之,试图控制者有之,资助扶持者有之,趁机掠夺者亦有之,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与政商关系,无疑进一步增加了银行业的政策性风险。

当然,上述不同的风险类型往往不是独立发生的,当我们剖析一次金融风潮对近代银行业带来的影响时,时常发现其中既有经济波动、货币体系混乱等外源性因素,亦有银行自身风险防控意识与制度不健全,甚至在信贷业务中盲目投资的因素,间或也会出现政府直接或间接调控政策的影响。复杂的成长环境决定了近代中国银行业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 风险的隐蔽性强。由于银行业具有一定的创造信用的能力,因此它可以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创造新的信用,来维持、掩盖或补救已经失败的信用关系或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风险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近代中国金融业中外银行并存、现代银行与传统钱庄并存、抵押放款与信用放款并存、征信市场不规范、货币体系混乱、央行制度缺失、

〔1〕 王强,萨日勒:《近代中国银行业资金运用的若干特征述论》,《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国家监管无力、票据市场不健全、工商业发展失衡、投机市场活跃等一系列特征又增加了银行业进行市场危机辨识与预防的难度,金融市场中的任何一个金融组织,甚或任何一个金融业务发生风险,都可能引发全金融业范围的金融风潮,风险的源头、传播渠道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也进一步加强了金融风险的隐蔽性。

(二) 风险的传导速度快。尽管近代中国金融业的业别构成中既有现代银行业,也有传统钱庄、票号,它们各自的业务性质亦不尽相同,但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合作关系是十分紧密的。以早期金融机构间的票据贴现为例,因长期以来的商业习惯,传统钱庄签发的庄票成为上海票据贴现市场流行最广的票据,“今日各银行所收贴者,大抵限于殷实钱庄所出之庄票,沪汉两地均以此为唯一之贴现物,盖庄票为市面上最有信用之票据,中外商人皆重视之也。故定货、出货、汇兑、贴现,莫不以庄票为辗转让受之具,各业交易多以此代现金,以为交换之媒介”^[1]。鉴于庄票在国内外贸易中的不可替代角色,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均愿意为资力雄厚的钱业公会会员钱庄所出庄票实行贴现,由此庄票不仅成为钱庄间相互资金融通的工具,也是钱庄、中资银行、外资银行间的资金连接媒介。^[2]但问题在于,传统钱庄一般资力较小,且多为无限责任性质,对市场风险的预测与防控能力较弱,一旦经营出现问题,庄票不能按时兑付,就易引发挤兑,在恐慌心理作用下,挤兑会迅速扩散蔓延,进而波及中外银行,一夜之间即可酿成金融风潮。与庄票的作用类似,领券制度、同业拆借、同业存放、相互持股等近代中国银行业的普遍业务特征,往往成为金融风潮在不同金融机构之间得以迅速传播的渠道。

(三) 风险的危害性大。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完善的风险防控机制下,多数金融风险是可控的。然而近代中国银行业在风险防控方面存在的诸如缺乏健全的中央银行制度、纸币社会信用低下、银行业投机盛行、银行资

[1] 马寅初:《中华银行论》,商务印书馆 1929 年版,第 143 页。

[2]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0 页;吴承禧:《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128—129 页。

金分布过度集中等问题，导致金融风险爆发后，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管与控制措施，陷于失控的状态，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从 1883 年上海金融风潮、1897 年贴票风潮、1910 年橡皮股票风潮、1917 年“停兑令”风潮、1921 年京钞风潮、1927 年汉口集中现金风潮到 30 年代的白银风潮等历次金融风潮，尽管引发风潮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不仅持续时间长，有的达数月之久，而且波及范围广，往往银行业、钱业、工商业皆陷身其中，30 年代的白银风潮甚至导致十数家银行因之而倒闭，^{〔1〕}更恶劣的后果是频频爆发的金融风潮使社会信用体系濒于崩溃，社会公众丧失了对银行业信用的基本信任，这无疑又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风潮发生的可能。

在各种金融风险的制约与冲击下，近代中国银行业如何还能实现质量与规模的双重发展，并逐渐取代外国银行与传统钱庄成为近代金融业的中枢？尽管近代中国银行业获得现代化发展的积极因素众多，但一个适合中国银行业及其社会环境特征的风险防控机制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说，健全、高效的风险防控机制是衡量近代银行业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

二、学术史回顾

1980 年之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尤其是加入 WTO 以来，银行专业市场逐渐向外资开放，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海内外的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金融市场中，健全的风险防控机制是保障银行业自身资金安全的重要保障。受现实因素的影响，以及金融史研究日益强调史学方法与经济学理论的结合，之前仅在经济理论学界讨论的风险防控问题逐渐受到经济史学者的关注，与当代经济问题关系最为密切的近代银行业的风险防控思想与经验，自然更是关注的重点，陆续出现了一批专门的研究成果。

〔1〕 吴承禧：《民国二十三年度的中国银行界》，《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2 号，1935 年 1 月；吴承禧：《民国二十四年的中国银行界》，《东方杂志》第 33 卷第 7 号，1936 年 4 月。

较早涉及银行业风险防控问题的成果出现于各类文史资料等回忆录性质的部分文字中,内容多以记录近代金融风潮爆发的经过及危害、银行家关于风险防控的意识与思想为主,这些资料通过不同参与者或经历者的回忆,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现场感性资料,^[1]但因其个人回忆性质所限,资料的真实性与准确性有待进一步考证。

部分银行通史研究、银行家研究著作中亦有涉及风险防控机制的内容,此类研究重点多在于梳理银行、银行家在政治危机、金融风潮中的应对措施,如姚崧龄、卜明、兰日旭等人在著作中肯定了张嘉璈、宋汉章在1916年停兑令及随后爆发的京钞风潮中为维持中行信誉,坚决抵制停兑令的努力,^[2]程麟荪通过对近代银行家群体的研究提到加强银行内部管理是银行克服种种危机的重要因素。^[3]另外也有部分银行家思想研究的作品在关注张嘉璈、陈光甫、李铭、钱新之等近代银行家成长经历的同时,注意到他们的现代银行风险意识与内部风险控制对银行稳健经营的积极作用。^[4]如张嘉璈一直将稳健经营作为银行管理的要领,他坚持在中国银行实施的改良会计制度、完善行员选拔机制、重视信用调查等管理措

[1] 此类回忆性质的文字包括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工商经济史料丛刊》,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寿充一编:《中央银行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工商联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聚兴诚银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吴经砚编:《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许家骏等编:《周作民与金城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文昊编:《民国金融大亨》,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等,另外又有天津、浙江、武汉、广东等地方政协文史委员会所编著的经济、金融类文史资料,诸如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浙江近代金融界与金融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河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河北近代经济史料》,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内容涉及近代金融人物、银行风潮、制度建设、经营特征等诸多方面,内容浩繁,篇幅巨大,此处不一列举。

[2] 姚崧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兰日旭:《张嘉璈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拒兑风波》,《中国金融》2011年第22期。

[3] Linsun Cheng, *Banking in Modern China: Entrepreneurs, Professional Manag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anks, 1897-193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徐予、顾关林、姜天鹰主编:《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钟祥财:《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姚会元:《中国币制银行》,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薛念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黄江华:《服务、信用、创新:爱国银行家陈光甫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2013年版。